

青年学术丛书·政治

YOUTH ACADEMIC SERIES-POLITICS



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 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

黄天华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青年学术丛书·政治

YOUTH ACADEMIC SERIES-POLITICS



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 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

黄天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余 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黄天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3377-5

I. ①边… II. ①黄… III. ①政治制度史-西藏-1906~1949 IV. ①D6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2761 号

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

BIANJIANG ZHENGZHI JIANZHI YU GUOJIA ZHENGHE
YI XIKANG JIANSHENG WEI KAOCHA ZHONGXIN

黄天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377-5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系“教育部一般项目《边疆建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地区为考察中心（1906—1955）》（项目编号：10YJC770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的康藏边政：康藏纠纷与西康建省研究》（项目编号：12JJD78006）”的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晚清西藏变局与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	15
第一节 晚清西藏变局与清政府逐步重视川边地区的治理	15
第二节 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与西康建省的筹议	22
第二章 民初两次康藏纠纷与川边地区的治理	35
第一节 第一次康藏纠纷与川边经略使的设立	36
第二节 中英西藏交涉与第二次康藏纠纷	40
第三节 川边镇守使与西康屯垦使的设立	54
第三章 康藏关系的新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初步应对	61
第一节 刘文辉主政西康与西康建省之议再起	62
第二节 第三次康藏纠纷与南京政府的应对	66
第三节 格桑泽仁事件及其影响	78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西康局势的强力介入	89
第一节 红军入康与诺那事件	90
第二节 班禅返藏事件及其对康藏局势的影响	94
第三节 西康建省委员会的设立	98
第五章 西康正式建省及其各项建设措施	109
第一节 西康正式建省	110
第二节 甘孜事件及其对刘文辉治康理念的影响	115
第三节 西康省的各项建设措施及其成效	130
第四节 西康省与西藏时局	142
第六章 总结与思考：“国家整合”过程中的边疆与民族	149

第一节	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	149
第二节	外国势力与康藏局势	153
第三节	土司、喇嘛与地方政治	156
第四节	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159
附 录	164
参考文献	165
后 记	181

绪 论

1929年，松潘大寨土官但真王吉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等人说：

“大清皇帝出不出来还不晓得的呵！”

“大清皇帝真好。他每年要给我二十四两饷银；三年去朝贡一次，他还赏给我们很多东西。民国政府不给我们饷了，我们也不去朝贡了。”

“此刻，听说，没有皇帝，官也要拿来选。你选这个，我又去选那个；选来选去，两边打起架来；时而赶走了这个，时而又赶走那个；这个说那个不对，那个又说他自己好。成都‘三大宪’也就换过不少了！到松潘来的大官小官，一下说是这个放来的，一下又说是那个放过来的；有些同是一个放来的也会打起架来，我们弄不清这些那些，也不晓得怎样才好！”一言以蔽之：“还是大清皇帝出来要好些。”^①

这段颇有意思的话透露出很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清朝体制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民国时期政局混乱之间的强烈反差。皇帝不管换了多少茬，但每年赏银和三年朝贡一次的规矩一直延续着。而民国时期不仅成都的“三大宪”如走马灯似地换，就是管辖松潘土司的大官小官也在不停地换，而且是用“打”和“赶”的方式换；就连同一个上司放来的官也经常打起来，这使得土司们弄不清楚，“也不晓得怎样才好”。这无疑会使得土司们无形中

^①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王明珂编校、导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版，第99页。原作者注称“从前谓总督将军和提督军门为三大宪，现在他们用为统呼成都高级官吏的名称”。又，王东杰：《华夏边缘与“现代性”：一九二九年的西番调查》（《读书》2005年第6期）和朱文惠：《1912—1940年康藏纠纷的多方对话—以康巴观点为例》（《中国藏学》2011年第S1期）都引用了这一条史料，并从其他角度给予了解读，值得参考。

就把民国看低了很多,以至于觉得“还是大清皇帝出来要好些”。同时,朝贡至少从形式上维系了皇帝和土司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而民国时期土司们根本不去朝贡了,结果土官和中央政府之间联系就中断了,难怪他们并不很清楚国内政治状况,更很少有人知道新的政治首都是南京。有一位喇嘛就问黎明:“宣统皇上这一会还好吗?”南京“是洋人的地方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民国时期的政统变了,从帝制转向共和,旧的体系打破之后,新的体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二是中央的式微,中央已不能有效管控地方,四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成都如此,偏远的松潘就更感受不到中央的福泽和威仪了。

无独有偶,1932年国民党中央所委任的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巴塘人)也在康区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凡在大道以外各县各乡村间之居民,根本上对于民国无所认识,三民主义更莫名其妙,所以许多村民,常询问当今皇帝何人,或曰闻连年内地纷乱不堪,皆因真命天子未出所致,渠等所共知者,中国有唯一之皇帝,例系文殊菩萨化身,住于北京城,内地并有一佛地,名五台山,除此之外,对于南京也,上海也,以及国内一般领袖伟人也,均毫无所闻”。对此,格桑泽仁的感受是:“本来中国以五族共和,地大而交通不便,名为一国,实际上几等异域。”^①

曾于1943—1946年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的沈宗廉也回忆说:“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更迭,当初被称为天子的‘皇帝’,如今被寻常路人可以当的‘总统’代替了,这是大多数西藏人无法接受的。”^②以前的皇帝是天之子,或者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西藏人心甘情愿地信奉和服从;如今的总统寻常路人可以当,也就是说权力世俗化了。这种权力来源的变化、政统的转换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人无法接受的。

1943年,从西藏求法回来的法尊法师就说,当时西藏对于中央政府,可以说是持“一种远远观望的态度”,“他们也怀着一种内地能够统一的企望,他们现在有些人也知道内地统一之后,仍然归服中央比归服英人要好的多。第一就是一家的观念,早就有的,用不着再去重新练习和构造。第二内地无论如何

^①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无出版项,第15—16页。

^② 沈宗廉、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柳晓青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改变,终是一个信佛教的国家,绝不会闹到全无佛法和全无信佛的人。第三汉藏同是一种黄色的民族,语言方面也有许多互相借用,不像英语那样生涩格格。第四蒙满民族的佛法,纯然是西藏的佛法,下至所诵的经文,都是整个的西藏字,并没有改动分毫。第五蒙满青甘诸省的佛教建筑以及文化等,多半是西藏的佛教建筑及文化。第六西藏三大寺的当权僧众和有大学问的僧众,蒙青等处的人很多,他们都有以内地为家乡的观念”。“若是中国内地确实能够统一了,西藏确是可以不成问题的归为中央所有”。^①他又说:“西藏当局在前几年,他觉着我们中央是不会统一的,是没有实力能敌御外侮的,是没有力量能达到西藏的,是没有心思过问西藏的事的,是不能调解班禅回藏的事的,尤其是他觉着我们中华民族自从反正以来通同变成了西洋化,耶教徒,更没有一点佛法存在——西康的人这种见解尤甚,他们觉着皇帝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连皇帝都打倒不要,岂不是西洋的邪见吗。他们这种错误见解很深,他们总是固执不舍。”^②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藏高僧喜饶嘉错也指出:一般边民固执旧习,“不能忘情于皇帝者,亦因满清专崇佛法一端,非他故也”。^③在在都说明皇帝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同一般的。而且,西藏人认为不要皇帝是耶教徒的做法,是西洋化,这种“没有一点佛法存在”的做法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从凤全和格桑泽仁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来。

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巴塘土司及喇嘛戮杀,史称“巴塘事变”,而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民众看来,凤全等人“习洋操,学洋话,行洋礼做作”,“冒犯神灵,污秽天地”,“此乃实为国内之祸患,扰害地方之贪官,故耳不揣有罪,一时错乱,已将汉官二员及洋人一并诛戮。此番原为国除害,实出无奈……”。^④

1932年,格桑泽仁回康办党。当时四川省都还没有正式成立国民党省党

^① 法尊法师:《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399页。

^② 法尊法师:《现代西藏》,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14页。

^③ 《参议员喜饶嘉错等在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关于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提案》,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6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

^④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一编(上),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19页。

部。格桑泽仁到达康区后，“首先展开宣传工作，当时不仅藏族人民闻所未闻，惊奇注视，即驻康之川籍官兵，亦感觉新异，以怀疑之态度视之。当时康藏人民，一时互相讹传，认为巴安所设立之党部，乃一种外国洋教。盖自清季以来，藏人从未见政治仪式上有俯首默念，唱党歌、读遗嘱之举动；他方面康藏人亦偶见外国传教士礼拜祷告时唱赞美诗之情形，与此类似，所以怀疑。以康藏人之普遍热诚信仰佛教，倘党部被误会为与佛教相反之一称洋教，则于工作前途影响殊重。本人乃多方奔走宣传，并向各大德高僧详细解释，印发大量藏文传单，强调两点：一、三民主义是政治不是宗教；二、三民主义符合释迦佛的救人救世精神，两者不相违背；并引申班禅大师在南京中央党部之演讲以证明之（当时本人为翻译），误会乃渐消除。惟一般喇嘛及头人等，前来参加党部开会，一见仪式，终觉不安而图回避。巴安包昂五呼图克图，素为康南人民所信仰，彼之脑筋比较灵通活泼，与我长谈多次之后，甚为明瞭，对党部十分赞助。彼向党部建议，欲康人不怀疑，进而踊跃参加党部，研究三民主义，亦在礼堂中总理遗像之旁，悬一释迦佛像”。格桑泽仁顺从他的意见，以为权宜之计，果然从此僧俗一致热烈参加。^①

格桑泽仁又说：“边疆地广人稀，一切均属落后，非内地人士所能想像。……在内地有些同胞认为你是狭隘自私的观念，顽固落后的思想，而在边疆有些同胞，又认为你是洋化汉化的摩登人物，危险份子。”^②

这里有两点甚是值得注意。一是很多藏人一度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与佛教相反的洋教”，所以反对、抵制；这提示我们在研究近代形形色色的“主义”时，要注意它和宗教之间的异同及其互动关系。二是一些西藏人这时觉得汉化和洋化有些类似，因为汉人已经洋化了，而洋化正是他们所反感的，所以他们也有些抵制汉化；这就提醒我们，在康藏史研究中，一定要对康藏人民的宗教观念和思想观念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康藏人虽然抵制和反对天主教、基督新教，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1929年前后，松潘等地的番人在成都看到汽车，就在心理上被慑服了。黎光明记载说：“西番在从前本来是很

^①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自我介绍，代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自大的,不知道汉人地方的情形,近来他们时常有人到成都,看见到处都是兵,又看见马路上的汽车跑得那样快,他们心理上便被慑服了,常说,‘汉人是不好惹的!’”^①飞机也是近代传入的西方新事物,康藏人就特别敬畏其威力,将之呼作“天菩萨”。1939年,川西北的绰斯甲土司反对西康省政府在当地开金矿,但又怕政府派人开飞机来金矿,无法应付。据载,绰斯甲“土人性畏飞机,称为‘天菩萨’,常戏叩以‘政府若派天菩萨来开办金厂,将奈何’,皆默不作答”。^②

同时,在西方冲击后,内地人的观念和眼光改变了,连带着看康藏人的眼光也变了。在康藏这块曾经被内地人视为蛮夷、落后的地方,如今在一些人眼中却被认为是很文明了。曾任道孚县知事的朱增鋈就发现康藏人的“天足”正是“文明”的表现,其婚姻也甚是自由,他感叹道:“自由结婚,西欧文明,不图潮流,远输边地。”他曾“讯夫妇各请离婚一案,询厥底里,供称婚嫁未久,例应各寻新交,予遵西例,笑而允之”。^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来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经常在川藏地区宣扬某某少数民族是西方人的后裔,这对当地人的观念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37年至1938年间,顾颉刚在甘肃、青海的藏族地区就发现:“许多黄发碧眼的人们在那边混着,他们已住了十余年二十余年了,说的番话纯熟得同番民一样,而且他们男的穿了没面羊皮的番装,女的头上梳了数十条小辫,表示其道地的番化。到了番地里,挨家送礼,表示其亲善。听说他们又替番民照相,检出鼻子高些的,眼睛深些的,便说:‘你本是和我们同种,只因流落到中国来,才比我们差些了。’我又曾看见他们画的地图,把我们的行政区域改变了,他们要西藏地方扩张到怎样远,界线就画到那里去。”1938年底,顾颉刚到云南后,“又听说这些侵略的先锋为了当地的夷民笃信诸葛孔明,又在捏造故事来装点自

^①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4 年版,第 89 页。

^②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5 页。

^③ 朱增鋈:《川边政屑》,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112—163 页。按,1929 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员黎光明等人也在川西北松潘等地观察到了很多与通常认知截然异趣的现象,值得参照比对。请详见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4 年版;王东杰:《华夏边缘与“现代性”:一九二九年的西番调查》,《读书》2005 年第 6 期。

己，说耶稣是哥哥，孔明是弟弟，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了”。^①

一些外国传教士又在四川宣称羌族是古希伯来人的后裔，川南的夔人悬棺安葬的是白种人或高加索人。1939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去西昌等宁属地区视察时，又发现“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这一事实给了刘文辉很大的刺激，于是制定了“一部脱历史窠臼、别开生面的《治理宁属边务方案》，开宗明义地规定：“宁属边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应受国家法律上之平等待遇。”^②

而民族平等这一近代传入的新观念也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宁属黑彝土司岭光电“曾受新式教育”，是中央军官学校第十期毕业生，在汉族人士看来，其“眼光远大，思想清晰”，“为边民中最有希望之人物”。^③然而，他自己却回忆说：“在外求学期间，亦因彝族地位低下而受尽歧视，处处显得低人一等。我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时时冲撞着我的心灵。”他对俄国人顾彼得说：“虽然汉人把我们称作‘猓猓’，但我们十分憎恨这个称呼，因为它是蔑称，汉字里的偏旁带有‘犬’字，反犬旁的意思就是‘野兽’，我们也许是野蛮人，但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当着面这么称呼他。”^④

1931年，另一位彝族曲木藏尧（汉名汪济西）呈请国民政府将宁属划归西康省并提高宁属夷族之地位，其言曰：“查夷族与藏族同为三危之后，其血统、生活、语言等皆与藏族相近，加以地势亦与西康毗连，应划入西康范围，俾便治理而固国防。又查宁属夷族所处地位极不平等，时受当地汉人之轻视欺压，过去汉夷纠纷皆由此酿成。……今我政府本总理遗教建国，而民族主义之使命在扶助弱小民族平等，对于宁属百万之夷人，亟应提高其民族地位，增进其文化，改善其生活。现为吾百万之夷人请命，谨建议五事于左：一、请明令承认夷

①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4页。

②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611—612页。

③ 朱契：《康昌考察记》，梁公卿总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4辑，《西南民俗文献》第12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

④ [俄]顾彼得：《彝人首领》，和镑宇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96、143页。

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二、请明令夷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与汉人享受同等地位;三、请明令汉夷婚姻平等,过去夷人之女汉人可娶,汉人之女夷人则不能娶,此为汉夷不相合之一大原因;四、请沿中央待遇蒙藏青年求学办法,于京中设立夷人教化学校,教育夷族中能通汉文之青年;五、请于京中设立夷务办事处。”^①彝族人岭光电、曲木藏尧的切身体会就是自己经常受到汉人的歧视,以致有“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时时冲撞着”他们的心灵。他们希望中央“明令承认夷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将宁属划归西康,以得和藏族待遇平等,当然更要和汉人平等。

然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把宁属归“尚未开化之西康”是“弃明入暗”。因为宁属“开辟有二千余年之历史,文化水准与内地相同,而鸿通俊异之才,代不缺乏,与通都大邑人士,把臂入林,未遑多让,……倘使下乔木而入幽谷,使僻于尚未开化之西康,则用夷变夏,虽妇孺亦非所愿”。^②这说明近代中国存在着两种趋向,一方面是一些少数民族力图追求民族平等,另一方面则是延续几千年的“汉化”继续在进行。

晚清,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即在川边地区大力推行“用夏变夷”的政策,施行儒家“教化”,这说明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部分满清官员对华夏文明依然保持高度的自信。赵尔丰把兴学作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他认为需“先求文字语言相通,然后为其演说纲常名教之理”,才可能引导边地民众视“中土圣地为人生不易之归”,而不至于再为“歧途所惑”;“教以汉字,无非令其同文”,“于开通智识之中”,还隐含“混化种族之计”。^③1911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焘甚至明言:“今之华夏大都古之蛮夷,如西康在未改流之先,蛮夷也,则康为川之边;既建省之后,华夏也。”^④

① 《蒙藏委员会公报·公牍》第15期,北京图书馆1993年版,第83页。

② 《为省务会议议决建南九属旅京同乡会代电牖陈划建入康不可理由、仰恳保存川疆坚持到底一案由》,《四川省政府民政厅签呈(1938年7月12日)》,《四川省政府批令(1938年民字第18711号)》,《建南、宁属民众旅京、省同乡会代表呈反对划宁属建南归康、川康两省互争卓斯甲布地段与内政部、四川省府、西康建省委员会来往行文》,全宗名称:四川省民政厅,全宗号:54,案卷号:7701,四川省档案馆藏。

③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④ 傅嵩焘:《西康建省记》,梁公卿总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3辑,《西南史地文献》第19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0页。

民初依然有部分藏族民众自愿归汉官管辖。以前属“藏番管辖”的莫东、董日两村头人即于1916年9月向同普县知事呈报愿意归附：“前赵大臣（即赵尔丰——引者）抵边，各属改流设治，而头人等地方偏居一隅，竟置化外。头人等屡欲输诚内附，虚愿莫偿。今值知事大人来同，仁风善政，遐迩咸钦，百姓等特具结前来委托头人代达，甘愿归同普管辖，完粮纳税，支应差使，伏乞俯纳，俾头人等两村人民得托庇宇下，有所依归，则感激无暨矣。”^①

需要指出的是，民初川边局势很大程度上受到川康地方势力强弱的影响，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中央地方一致、同心协力，康人就更能感受到汉官威仪。如果中央、地方之间陷入长期争斗，内耗不已，康人就会轻视汉官。刘文辉就说：“四川安则康藏亦平静无事，四川乱则康藏问题亦随之而兴。”^②即使是诺那呼图克图这样提出过“康人治康”的地方精英，在早前也认为：“我们西康人，不要听信谣言，对于四川妄想打主意分家，各干各的，那是现在的西康万万不能行的，只有我们西康人与四川人，大家联络起来，协力同心，来把西康的事情，好好的办理一下，这才是西康人要紧的事情，也是处于扶助地位的四川人，应尽的责任。如其遇着一派挟私心，说大话的人，我望你们不要听他，他们的办法，是使我们西康人，永远不能抬头的，……西康与四川，从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期，逐次的想来，都是彼此间很有重要关系的，假若我西康人民，要是去听坏话，与四川分开完全脱离了关系，那就没得第二个有实心实力愿来帮助的人，好好一个西康，定会送到帝国主义的手里，使我们子子孙孙，都受苛残压迫的痛苦了！我西康的人民呀！决不可听旁的骗人的话呀！”^③从民初川边地区主政者尹昌衡、殷承瓏、陈遐龄、刘成勋等人的上任、离任，到刘文辉经营西康时用心用力之程度及其变化过程，在在都可看出四川局势演变对川边的连带影响。

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要到1935年才能实质性地影响川省局势的发展，到1939年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和1940年蒋的心腹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之后，中央政府才算比较能够掌控川省的局势。但川康实力派刘文辉、

^①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② 正鳌：《川谣与康藏》，《康藏前锋》1936年第89期，第3页。

^③ 诺那呼图克图口述，罗松涛记录，胡吉农校订：《诺那告诉西康民众的几句话》，《新西康》1930年特刊号，第8页。

邓锡侯、潘文华等与蒋介石实际上处于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到了1949年12月,这三人终发动彭县起义,背弃蒋介石,投向人民阵营。

在川边长期为官的陈启图就说,由于历任川边镇守使的放任,“关外诸将士纵兵虐民,地方牧令,更猥杂无伦,市侩其行,恣意蹂躏,边民无所控诉。藏人遂得乘隙要结,嗾其背叛,历年溃兵军械,又大半为蛮人所得,益有所恃,故一经开衅,汉兵靡不失利,盖由主客之形既判,众寡之势又殊,遂至屡战屡蹶也”;而边民“实非有爱于藏方也”。^①在1917—1918年的第二次康藏纠纷中,边军的失利使得“汉官汉军,在川边之声威,一落千丈”,政府政权乃益趋衰落。“康北人民前此之对于政治绝对崇信,从此虽不即有小视政府之心理,然而至少使人民发生怀疑政府之点,成为一种政权衰落的转变。……即康南以后造成不治之局,民七战役实为一大关键。康北仅有之甘孜、炉霍、道孚三县从此遂成为不生不死之局面。”^②可见川边主政者在当地的经营力度及其在康藏纠纷中的胜败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关系到川边的人心向背。

在历次康藏纠纷或重大事件中,康区土司的向背深刻影响着局势的发展。黄慕松就指出:“二十一年藏军之败北,孔撒土司力莫大焉。”^③有人又说:“(德格)土司庞大,辖有多数头人,复活以来,仍握有邓、德、白、石、同五县之实权。而又介于康藏之间,事齐事楚,均有可能。即现隶政府之下,对藏仍不忘回顾,频送秋波,盖不欲开罪于任何一方也。模棱两倚之态度,为其十年来生存策略。”地方当局也不得不极力笼络和羁縻这些土司,据记载:“德格土司在康区的势力很大,国民党历来重视笼络利用他,不时加官晋爵,送枪送马。”^④德格土司之下最大的头人夏克刀登,因“家宅、田产、农奴、百姓皆在河西,尤有不能不与藏官周旋之处。表面虽云对汉方效忠,内情莫可得而测

① 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② 佚名:《治理康区意见书》,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07—409页。

③ 《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④ 《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文阶:《德格写真》,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也”。夏克刀登曾先后归附诺那和红军，且“红军退康时，青军驻防邓、德、白、石四县，彼复导藏军渡江，逐走青军，占领四县，恢复民七以来原状。盖彼家在河西，固以土境全隶藏方为利也。后因班辕返藏之威胁，藏军退回金沙江西。夏克复输诚刘文辉氏，获其信任”。^①由此可见，土司、头人的向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本原则就是归附于最有实力且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方。所以，历史的结论应该是“治藏必先安康，安康必先兴川”。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反过来，“后传统时代也是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②在打倒皇帝之后，民初中国尝试了共和制，随后国民党又建立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但以前在清朝皇帝治下的一些族群却并不认同这两种新的政治体制，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洋化，内中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有了离心倾向；另外一部分则受西方新观念的影响，努力追求民族平等，反对汉化。总之，以前被广泛认可的汉文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少数民族不再认为汉族和汉文化是最高、最好的，他们有了新的参照系，于是乎近代中国出现很多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同步、不协调的现象，产生很多和以前大不一样的纠纷与冲突。外国势力且乘虚而入，夺取很多中国的主权和权益，造成很多影响重大的边疆危机，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1937年，时人就说：“一国之安危，恒系其边防之虚实，蒙藏地方辽阔，袤延万里，居我国边防最前线，号称西北屏藩。近四十年来，外力翼翼侵入，门户洞开；……十年来，边疆各部，时有畦畔之争，虽为局部纠纷，往往足以影响大局。”^③诚哉斯言！检视近代中国的蒙藏问题、新疆问题、东北问题，无一不是如此。

在这样一种新旧过渡的时代，各种势力都在竞争、角逐，都希望取得领

① 任乃强：《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边政公论》第5卷第2期（1946年），第11页。

② 详细的论述请参见王汎森：《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时代的傅斯年》，《读书》2012年2期。

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关于蒙藏行政之设施》，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6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266页。

导性或压倒性的地位,或者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在各种大的势力或群体之间,还有很多小的势力或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的主张和选择,甚至有意利用其倚重倚轻的中间位置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可以从近代汉、康、藏三方互动历史中得到证明。1945年,格桑泽仁指出:“赵(尔丰)氏之建省经营半途而废,遂致西康陷于政治上青黄不接之恶境。盖旧制度已遭破坏,新制度未能建立,实为三十年以来康区混乱不安之主要原因。”“东藏(即康区一引者)各地之最大问题亦即东藏人民最大之痛苦,乃在新旧制度并存,人民夹在汉官与土头双重管制负担之下,不胜其重压之苦。复因县府与土头互相推诿牵制,亦因任何一方之权力不够完整充实以致各地治安问题丛生。今后欲求东藏政治之安定,人民痛苦之解除,要在于如何谋取新旧制度之合流,使县府土头势力合为一体。并宜任用当地人人为县长。……至东藏各地省县政府所办之教育及文化经济事业,亦多不能因地制宜,而按藏族人民之需要与习惯以求适合,仅一味以内地方式办法强行移植”,因此成效不彰。^①这充分说明建立一种能够合理地照顾各个势力或群体的利益,并获得他们共同拥护的新制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不断探索和适时调整的过程。

如众所知,清朝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形态大致可分为: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满族的八旗制,蒙古地区的盟旗制,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伯克制(伯克制在1884年新疆设省后取消,改为州县制),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即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理藏政),西南及部分西北少数民族的土司制等等,可谓名符其实的“一国多制”。

然而,自19世纪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以来,这种多元体制就面临严重的挑战,满、蒙、回、藏等族聚居的大片土地更有被西方列强不断渗透、蚕食的危险。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清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然而,清朝不久即因辛亥革命而垮台,千年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成立的中央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有效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宣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

^①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95—196页。